

济源文史资料

第三辑

薛绍铭（子中）黔滇川旅行记专辑

政协河南省济源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



薛绍铭（子中）烈士遗像



薛绍铭（子中）烈士与二弟薛作楫（左）
三弟薛作材（右）合影



一九三五年薛绍铭(子中)与妻子金瑞明、
长子健生留影



一九三七年薛绍铭（子中）回济源组织抗日武装时留影



一九三六年薛绍铭（子中）在黔、滇、川
旅行途中留影

致读者

这一期《济源文史资料》我们挖掘了我市革命先行者薛绍铭（即薛子中）同志于1937年由中华书局发表的《黔滇川旅行记》，现作为专辑，印刷于后，以飨读者。

《黔滇川旅行记》系作者薛绍铭同志的亲身经历。三十年代的贵州、云南、四川三省，由于交通不便，生产落后，经济、教育很不发达，加之政府腐败，匪患无穷，百姓生活极端贫困。当时，共产党员薛绍铭同志为了追赶红军，不畏路途艰险，环境恶劣，跋涉万里，一面探听红军的去向，一面不顾路途之疲劳，访贫问苦，深入调查当地政治、经济、学校教育和人民生活状况。薛绍铭同志追赶红军的愿望虽未实现，但他将自己在黔、滇、川所见所闻的真情情况，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，以日记的形式连续发表在国统区的刊物上，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政治上腐败和地方官吏、土豪劣绅残酷剥削压迫人民的罪恶行径，反映了工农劳苦大众衣不蔽体，食不饱腹的苦难生活，披露了红军在长征途中的神速行动、严明纪律和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。作者通过大量事实，还揭示了一个已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：只有彻底摧毁半殖民地、半封建的旧制度，中国才有希望，人民才有希望。这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留给后人的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。这份“遗产”，全国所存无几，今天我们把它发表出来，就是让年轻一代认识过去，珍惜现在，更加奋发努力加 我市

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。同时对于丰富祖国文化宝库也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。

为了帮助读者了解《黔滇川旅行记》的中心思想和历史背景，我们还请市志办主编刘荣华同志以《革命家的心声》为题，撰写了评价文章。并挖掘了薛绍铭同志生前的六帧照片，介绍了薛绍铭同志的生平事迹，使专辑更加完整充实。

编 者

1994年11月30

革命家的心声

读薛绍铭（子中）的《黔滇川旅行记》

刘 蒙 华

我有幸拜读薛绍铭（子中）烈士的遗著《黔滇川旅行记》（以下简称《旅行记》），受益匪浅。这本书是作者1934年夏至1935年冬在江南各省旅行途中写的大量笔记中的一部分，1937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。作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，对沿途见闻进行了如实的记述和精辟的分析，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政治腐败和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残酷剥削压迫人民的罪恶，反映了工农劳苦大众衣不蔽体、食不饱腹的苦难生活，并以隐晦曲折的手法，披露了红军在长征途中的神速行动、严明纪律和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。作者通过大量事实，揭示了一个已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：只有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制度，中国才有希望，人民才有希望。这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心声，是作者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，对我们认识过去，更加珍惜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新中国，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。

—

作者在《旅行记》中，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地方政府政治上的腐败堕落。《贵阳巡礼》一文，记述了省政府工

作人员吸食鸦片的情景。“省政府各厅各科办公室内常有鸦片烟灯在床上陈列着。师爷们办公前固然得吞云吐雾一番，办公后还得过一番瘾，来使精神兴奋一下。至于真正办公时间，每天都不到两小时。”这样的政府，能有什么作为呢？

《云南县长之特等肥缺》一文，记述了我国第一大锡产地个旧县长借处理矿商纠纷大发横财的事实。“矿地犬牙相错，矿商纠纷时起，有纠纷必成讼，诉讼一起就是县长发财的机会到来。”“此类官司每出一案，县长即可发财上万。故个旧县长任期亦甚短，普通多为一年。因为这个特等肥缺不能让一人久享，但一年县长所得已可使终身衣食无虑了。”人们可以想象，谁要想得到这个特等肥缺，不给握有县长任命权的省府长官送钱能成吗？

《曲靖的黑暗政治》一文，记述了国民党地方官员借任命下级官员层层索贿受贿的事实。“一个区长领到县长的委任状，普通都要运动费，但三个月后大半撤职。”“一个乡镇长由区长手里领到委任状后，也要运动费”。“乡镇长当然不是傻子，他们的本钱和利息，自然是有人偿还。”“这不仅一个曲靖县，黔滇边境各县，大都是如此，……在现在的中国，大约可以如此的肯定。”作者明白地告诉人们，整个国民党政权，已腐败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。

《四川的征收局长》一文，揭露了征收局长借征收粮税中饱私囊的事实。“征收局长多系和军部有特殊关系者，……一个征收局长发财可不亚于县长，粮税征收次数越多，局长即发财愈大。合川前征收局长某，闻其一年任内发财三万余元，而至今人民仍谓其为守法不苟之局长呢！”读者可以想象，那些被人民骂为贪官的局长，一年又该发多大财？

二

《旅行记》以大量篇幅，揭露了国民党地方官吏、土豪劣绅残酷剥削压迫人民的罪恶。《军队剥皮与民团抽筋》一文，记述了四川军阀在川西北二十八县横征暴敛的事实。

“计至二十四年五月截止，人民所纳粮税是至民国六十九年。二十二、二十三年，差不多是月征年粮。”“军官之家庭及有势力之豪绅均不完粮，其粮税则分摊于人民身上。”

“而地方团阀之剥削，犹在粮税以外者。”“一个农民卖女儿得了八元钱，民团摊派，他是得出五元。”作者写到这里，不由发出了“川北小民哀哉”的感叹。

《安顺概况》和《人民冤死不告状》两文，揭露了国民党地方官吏巧立名目榨取百姓血汗的罪行。“烟灯捐亦名吸烟罚金，凡吸烟者每盏灯月须纳税五毛。但不吸鸦片的人，亦须经常纳烟税捐。欲派以款，何患无名，实际上又何必巧立这些名目？就是无名捐，只要派到小百姓的头上，谁又敢少出半分钱呢？”“宣威各机关均无固定经费，其经费来源乃系用‘富户捐’名义摊派于人民。……有很多经乡镇长指定为富户而担任富户捐的人，却是三五个月连盐都没有尝过的人家。滇省一般人民真有冤死不告状的精神，而对于乡镇长的鱼肉尤不敢作声，因为作声反对，或伸冤告状，一定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，徒开罪了阎王爷，一切唯有一忍了之。”作者所爱所憎是何等分明。

《川东的佃农和高利贷》一文，记述了广大贫苦农民受地主和高利贷者剥削的情况。“土地权多操在小地主手里，佃农约占全农民的十分之七左右。凡佃农佃田而耕，视田中

产谷之多寡，先向地主缴纳押金，名为押佃。大约每谷一担（约可得米一百四十余斤）须纳押金十元。谷租与地主分配，有‘市租’、‘定租’二种。‘市租’按收成之多寡定租之高低，大约最高为三与七，最低为五与五之比。‘定租’大约为三七或四六之比，收成丰歉概不减让。”“这点却是和贵州汉人地主对待苗民佃农的方法是不约而同。剥削者的思想行动，大约无论远近都是同出一辙吧！”作者以无产阶级的观点看问题，说明剥削者的思想和行动，是由其阶级本性所决定的。接着作者又写道：“农村高利贷，是和农村破产的程度平衡地向前发展着。农村破产越深刻，高利贷的利率是越高些。‘金斗翻’大约每大洋一元利息一日为一角，自借贷之日起每日还一角，十一日还完。”在《德阳的‘官长粮’和‘衙门账’》一文中，作者还揭露了地方官员挪用公款放高利贷的事实。“‘衙门账’的主人，不一定是县长，征收局长、账房、师爷都有份。而所贷之款，多为暂时挪用各种税款。征人民以税，贷人民以款，税变款一周转，转来转去，总不外小百姓的几个钱。”作者爱憎分明的立场、感情，跃然纸上。

三

《旅行记》以活生生的事实，反映了工农劳苦大众受苦受难的悲惨生活。《三吹三打和鹌衣千结》一文，概括了滇黔两省人民饥寒交迫的情景。“普通人民所食，则为‘三吹三打’，十天半月见不到一粒米麦，尝不到一点油盐。‘三吹三打’就是芋头烧于火炭内，烧熟时因为上面有一层灰，须先用嘴吹灰，再以手打灰，然后才能吃。普通人民一日两

餐，全为此物。”“普通人一件衣服是穿终身，或穿数辈。最先是一件单衣，破一洞，加一补，以至补到几十层，有布片，有麻片，形形色色，冬夏全是此一件，昼夜全是此一件。而此衣服尚不能普及于每一人，尚有多人穿草衣。儿童十五六岁以下，终年是赤着身，有太阳时晒太阳取暖，无太阳时则藏卧于草中。女孩十五六岁时，仍多无破裤可穿，仅用麻片以遮身，此非少数者，普通大约都是如此。”

《绵阳人民之逃粮办法》一文，记述了人民为苛捐杂税所迫纷纷外逃的事实。“当时北乡农民，因田地之收获除过赔上劳动力外，对完粮摊款尚不敷甚钜，而典卖又无门，有人乃将田契贴于门外，封上门，一家外逃，请政府派款时，可尽量拍卖其田产好了。”

《个旧锡厂概况》一文，反映了工人所受的非人待遇。“矿工多系十岁至十六岁之童工，工作为由洞内向洞外负坭。洞道高仅二三尺，成年人身材较高，来往不便，即童工亦不得伸腰而行。洞深普通为三千尺以下，来往一次约需两小时，工人负坭，大约每日最多六次，所得工资，高者合国币三角余，低者则仅角余。”“到厂后，工人的自由是完全失掉，其所领得的安家费，常三五年偿还不清。所谓安家费，无异于卖身钱。矿工如潜逃被矿主抓获，先是一顿拷打，再是两脚钉以镣铐，但钉镣铐后，仍须下洞工作。年末工人死亡率颇大，病时休息且不许，医药更当前不到，一息尚存，仍须下洞，直至死而后已。死后恤金分文全无。这就是工人的待遇。怪不得作者经过天良洞时，会情不自禁地说：“天良，天良，资本家真乃是有天良！”

四

《旅行记》披露了红军在长征途中的神速行动、严明纪律和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。由于作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表的，作者当然不能公开为红军作宣传，他只能采取隐晦曲折的手法，披露红军长征途中的一些情况。《兴仁的苗匪》一文，作者在说明苗民“为匪实生活压迫使然”后，写道：“当共产军西窜时，兴仁县城曾被陷，不过仅盘踞二三日，地方无大损失，人民对之亦无若何好坏影响，不过其纪律之严，行军之速，至今人民茶余饭后，尚多谈及。共党对于苗民曾用‘苗汉平等’、‘苗民得平均分汉人地主土地’等口号以煽惑。”在《人民冤死不告状》中，作者写道：“共产军窜滇，仅系过境性质，对人民多取拉拢手法，对富有者掳之去，但赎款去，即释之归，杀人甚少。人民所感之二重痛苦，则为共军过境后之兵差支应及官吏豪绅借口清乡之敲诈。……凡人民墙上留有共党标语而未洗刷，或共党至而未逃走，共党曾宿其家者，以及曾卖饮食于共产军者，均以通匪论罪。这样的清乡，人是拘了不少，钱也清到了不少。”

作者爱憎分明的立场，在《过泮水鸭溪》中同青年小贩的谈话，表现得更为明显。“在客店门首和一个青年小贩谈起话来，问他：‘红军到过你们这里吗？’他答道：‘怎么没到过，第一次住了七八天，第二次住了三四天。’又问他：‘你这年青人，红军不强迫你当兵吗？’他说：‘倒也不强迫，只是叫人去给他挑东西，不过人家红军，叫你挑东西还有钱，每十里给钱七百文，到地头就给，一个也不少，不象某某的军队抓伙，一个小铜板也不给，走不动还得吃棍

子呢！”作者接着评论道：“剿共的军队一定是军纪要比共军好，不然，不是剿共，而是造共，最低限度也是不会同人民发生好的感情。”得人心者得天下，失人心者失天下，红军之所以能冲破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而取得长征的胜利，正是得人心的结果。

在《苏维埃和钦差》一文中，作者还通过一位少数民族土司苏永和同红军的谈话，反映了红军和少数民族的亲密关系。“共军初至，他向红军问以‘你们是不是皇兵？’共军答以‘我们不是皇兵是红军。’他又问道：‘红军是谁家的兵？’共军答以‘红军是苏维埃的军队。’苏永和一听到个苏字，就高兴起来说道：‘原来你们是我本家的军队、我的本家坐了江山我还能蒙点福呢！’乃赠共军以牛、羊腊肉等食物。”这个少数民族土司不一定真正姓苏，他热情招待红军也决不是象他所说的因为是他本家的军队。真正原因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，代表了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利益。作者要反映红军与少数民族的亲密关系，可又不能说明真正原因，只好借所谓“本家”来说明问题了。

五

《旅行记》作者面对途中所见劳动人民的贫困状况，提出了一个如何改进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。也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。他在《再会吧贵州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此次所过各地，多走访当道及教育界人士，询及此后改进黔省人民生活的意见，各方所谈，大约可归纳为治标治本两方面。治标则为刷新政治，禁绝鸦片。治本则为便利交通，开发矿产。前者在原则上当无可非议，不过在实施上都有许多问题。至于

后者二项，姑不问交通如何能便利，矿产如何能开发，问题是：即使交通便利了，矿产开发了，在半殖民地的中国，也不过替帝国主义开拓原料地和销货场，黔省人民生活恐怕不惟不能改善，而且恐怕还要更贫困化。在交通已便利的省份，人民生活现在和过去相较，还不是很好的借镜吗？”作者在否定了关于治标治本两种意见后，写道：“贵州已在回顾中消失了，可是关于改进贵州人民生活的问题，却在我脑子里想来想去起了很大的疑问。”实际上，作者敢于否定当道者治标治本的意见，心中自有主张，只是不便明说而已。今天我们当然可以把当初作者不便明说的话说出来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，只有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及代表这一制度的旧政权，驱逐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，建立起独立、自由、民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，中国人民才能彻底翻身，人民生活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。

六

《旅行记》的作者在《自序》中提到，他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为了医治神经衰弱病，使精神有所调剂。这也许是原因之一，但根本原因恐怕是另有所想。作者出游的时间是1934年5月中旬。当时，正是党中央领导全面推行王明“左”倾错误，排斥毛泽东、周恩来等的正确主张，使红军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斗争中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。作者如果单纯是为了调剂精神（从某种意义上也可这样说）而出游的话，哪些地方不能去？为什么偏要到硝烟滚滚的福建、江西去呢？再从他旅行所经历的省份的先后次序来看，也基本上同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相吻合。我们从他旅行的路线及其所表

述的立场、观点来分析，可以认为，作者绝不是为了调剂精神才作此艰苦的旅行的。解玉川等人1958年编写的《中共济源地方组织简史》中，曾提到薛子中1937年返济后，对解等说过他沿着红军长征路线找红军的事。由此可以断定：薛子中江南之行，其目的是为了寻找红军，或者说，寻找党中央领导，绝不是为旅行而旅行。人们不禁要问，薛既然是去找红军，为什么没找到呢？谁都知道，战争中的军事行动具有最高的机密性。红军在长征途中，特别是在“遵义会议”之后，军事行动神速莫测，连国民党几十万大军都未能找到红军主力，何况一两个旅行者呢？实际上，薛子中1935年6月由广西进入贵州境时，中央红军已跳出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圈子，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。

当然，《旅行记》中也有些是在今天或在当时的革命根据地不该说的话。但我们应该体谅作者的一片苦心。他在一年半的旅途生涯中，历尽艰辛，长途跋涉，未能找到红军，个中滋味可以想见。但他要把途中所见所闻公之于世，以表明自己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坚定信仰。而要使作品出版发行，又不能不考虑当局所能允许的表述限度。这就要求作者在语言的表达上要字斟句酌，掌握分寸，以使作品得以公开发表，发挥其应有的宣传作用。